

国之瑰宝宋庆龄

唐宝林

一、少年忧国多奇志

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十），上海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在欢度了圣诞节和元旦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她就是宋庆龄。

宋庆龄辉煌的一生，根植于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这个家庭，尤其是她父亲宋嘉树的传奇经历和事业对她的教育和影响。

宋嘉树原名韩教准，原籍海南岛文昌县，9岁时随姓宋的堂舅闯荡美国，做堂舅的嗣子，改姓宋。后来，由美国一些慈善家和教会安排，小嘉树皈依基督教，进入神学院，受到严格训练，毕业后即被派回上海当传教士。但是，由于不堪忍受美国教会上层人士的歧视，他在宋庆龄出生前一年辞去教职，转向实业。宋嘉树“是个美国化的中国人”，主张中国建立共和，怀有民主革命的意识，同情反清，在此同时，结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以宗教和实业为掩护，秘密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

宋庆龄从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很快受到爱国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她爱听父亲讲述他的传奇经历和爱国情思，更

常常被父亲与孙中山的谈话所吸引。孙中山的救国思想和“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①的献身精神，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庆龄外貌温柔而内心刚毅，天资亦极为聪敏，7岁时进入美国教会办的女子贵族学校——上海中西女塾学习，除特别喜爱学习英语外，还对文艺活动十分喜爱。1907年7月毕业即留学美国，正式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宋庆龄一面努力学习，一面从父亲不断寄来的信件和剪报中，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那时正是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不断失败的年月，宋庆龄常为此而忧虑，思考中国的出路。一位历史教授感到十分惊讶，万万想不到，一个看起来温和的中国女学生，会有这种思绪。他对宋庆龄说：“我看出，中国现在经历的革命运动影响了你的感情。”她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坚定地说：“我坚定地认为我的祖国要有一个根本的变革”^②。

怎样变革？宋庆龄已经开始独立探索。她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政府腐败的根源在于官吏选拔方法的不当，主张通过改革教育、改革官吏任免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③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显然脱离当时的中国政治和革命发展的实际，但却符合宋庆龄本身思想发展的规律。同时也由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她不敢对革命作出大胆激进的设想。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大大改变了宋庆龄思想发展的轨迹和速度，腐朽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宋嘉树全家也随同前往，并参加了孙的宣誓就职仪式。从父亲来信中得到这个消息，并且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民国五色旗时，宋庆龄无比

激动，立即扯下学校中的清朝龙旗踩在脚下，挂上新国旗，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国旗帜”^④。接着，她写出了热情洋溢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胜利的意义，认为这场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已经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并骄傲地说：“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起来，并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实现世界和平”^⑤。文章又天真地认为，辛亥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然后将以和平的手段来实现“博爱”。

然而，辛亥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在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向革命派进攻时，孙中山曾为挽救革命进行了“二次革命”，但没有成功。1913年8月，孙中山等被迫亡命日本，这给宋庆龄很大的震动。正值大学毕业的宋庆龄放弃了在美国继续学习的打算，立即回国，投入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

二、南征北战“当学徒”

1913年8月，宋庆龄来到日本横滨，即由父亲陪同去拜访孙中山。她十分崇敬孙中山，在10天中曾8次前往拜访。次年9月，她正式接替姐姐宋霭龄，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这时，由于“二次革命”及其后一系列反袁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宋庆龄的到来，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她积极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经管经费等许多繁重的日常事务担负起来，并且完成得很出色，逐步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离不开的助手。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在患难中建立起深

厚的战友情谊，并且产生爱情。1915年10月25日在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协议离婚后，宋庆龄不顾世俗舆论的反对，与孙中山在日本正式结婚，忠实地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

婚后，宋庆龄更加积极地投入反袁斗争。1916年5月9日，在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宋庆龄协助孙中山起草了《第二次讨袁宣言》。与此同时，宋庆龄与孙中山还热情支持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他们的东京寓所里，经常坐满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在这个过程中，宋庆龄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克服了过去腼腆的习性，学会在各种场合与各种人打交道。

袁世凯垮台后，由于继承者段祺瑞无意恢复民国政制，而推行皖系军阀独裁统治，宋庆龄随孙中山一度到广州发起反段护法运动。由于西南军阀的破坏，1918年6月，他们又回到上海。

这时，为了寻找继续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深居简出，发愤读书，勤奋写作，认真总结奔走革命30余年的经验教训，终于写出《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它与1917年写的《民权初步》合称《建国方略》。在孙中山撰写这部巨著的过程中，宋庆龄不仅照顾他的生活和健康，还帮助他查阅资料，誊写文稿，共同探讨革命理论和实际的各种问题。《建国方略》中也包含着宋庆龄的一份心血。

1920年10月，孙中山指导并赞助的陈炯明粤军，把长期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逐出广州。孙中山到广州后，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首先挥师西征，直捣桂系军阀老巢。宋庆龄则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襄助讨桂战争。她经常携带捐款和物品，亲赴前线慰问，给予官兵很大鼓舞。讨桂战争胜利后，孙中山乘胜北伐，以图重建民国。宋庆龄组成“红十字会”随军

服务。

但是，留守广东的陈炯明为了保存实力，割据广东，反对北伐，于 1922 年 6 月 16 日乘孙中山和宋庆龄返回广州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宋庆龄虽身怀六甲，但以革命利益为重，不顾孙中山的竭力反对，挺身而出，留下来吸引叛军火力，掩护孙中山首先突围。然后，她又历尽艰险，才到一艘军舰上与孙中山相会。孩子因而流产，从此再不生育，致终身无子女。在这次事件中，宋庆龄大义凛然、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国民党内赢得了无限的崇敬，许多原来不满她婚姻的人，也开始刮目相看。

新的挫折，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和宋庆龄陷于深深的痛苦和彷徨之中。这时，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也把孙中山和宋庆龄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穷途末路中，引导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阳关大道上来。以俄为师 依靠工农 与共产党合作。当孙中山晚年放射出灿烂光辉时，宋庆龄犹如一颗硕大的卫星紧紧追随着他，并且有力地帮助孙中山完成了这个伟大的转折。

从 1918 年起，宋庆龄就帮助孙中山通过电报往返，与列宁和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等会见或会谈，与苏俄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孙中山终于放弃对英美西方国家的幻想，求助于俄国帮助中国革命，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实行扶助农工和联共政策。在五四运动中，宋庆龄不仅每次都陪同孙中山接见各地学生代表，指导学生的爱国行动，还根据孙中山的授意，分别起草致电批评北京政府，营救被捕学生，指出“学生无

罪”横事摧残为“全国之所不容”⁹⁶。但是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却遭到国民党内一些元老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见孙中山态度坚决，就来找宋庆龄，希图通过她影响孙中山。宋庆龄充分理解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意义并坚决拥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1924年11月，应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府的冯玉祥之请，孙中山由宋庆龄陪同北上，争取和平统一中国，以减少人民的痛苦。途经日本神户港时，宋庆龄应邀到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作了她平生第一次公开的演讲，阐明妇女的解放必须与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参加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斗争，受到在场近千名师生的热烈欢迎。这次演讲表明宋庆龄开始结束“学徒”生涯，逐步学会独立进行革命工作。

12月4日，船到天津，孙中山因一路劳顿，卧病不起，3月12日逝世。他临终留下遗嘱，号召国人仍须努力，实现国民革命，并嘱咐：“余因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⁹⁷

三、疾风劲草显风采

孙中山逝世后，继承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成了宋庆龄的奋斗目标。参加孙中山治丧活动后，她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通过向记者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和到北京参加群众大会，她愤怒谴责日、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暴行，热情阐发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和晚年为力争两广关余与英帝国主义顽强斗争的精神，号召国人“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⁹⁸，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她还对运动的开展提供一

系列指导性意见，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反帝统一战线，坚持到底，反对调和和中立，“唤起世界各国人民主张公道”^⑩等，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

国民党右派乘孙中山逝世向革命反扑，1925年8月刺杀左派首领廖仲恺，11月又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党本党党籍等多项决议。宋庆龄坚决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站在一起。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二大”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决议案，惩处了右派分子，稳固了国民党的基础，克服一次革命危机。宋庆龄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北伐，进展顺利，10月即攻克武汉，饮马长江。随着革命中心北移，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首都迁往武汉。但是，这时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崛起，准备篡夺革命成果。他们提出迁都司令部所在的南昌，并扣留路过南昌的国民党党政重要领导人，企图以军驭党，以军操政，实行军事独裁。宋庆龄又与共产党和左派人士一起，与蒋介石的无理行为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斗争，终于迫使他服从中央决定。1927年3月，国民党举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加强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限制总司令权力的决议。宋庆龄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但是，当时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超过了革命力量。蒋介石已经羽毛丰满，难以遏制。4月12日，他终于在上海公开背叛，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使大革命遭到重大挫折。宋庆龄无比愤慨，与武汉革命同志40多人发表《讨蒋通电》，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

贼”⁹⁰。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继蒋之后，东南、西南各省纷纷反动，武汉顿陷四面包围之中，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出现严重危机。宋庆龄为维持局势，力挽狂澜，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也实行“分共”，大革命失败。此时，蒋、汪都来拉拢宋庆龄，以抢夺“孙中山”这面旗帜。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在国际上联苏，在国内联共，以及扶助农工等革命政策，对蒋、汪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深恶痛疾，因之一概拒绝，并发表严正声明，谴责他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严正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⁹¹，断然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决裂。然后，她离汉赴沪，又巧妙摆脱蒋介石的监视，乘轮船于9月前往莫斯科，实现孙中山要她代表其访苏的愿望。

在苏期间，宋庆龄多次发表声明和讲话，阐明中国革命和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意义，呼吁苏联和世界人民继续支持中国革命。她认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对“中国的局势没有丝毫理由感到失望的”⁹²。她支持中共发动的武装暴动，认为“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⁹³并说孙中山40年为工农的幸福而奋斗，她如果回到国内，定要参加工农斗争。为了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捍卫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捍卫国民党组织的纯洁性，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坚持在政治上走自己的路。是年冬，她与巴比塞、罗曼·罗兰等共同发起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大会上，被选为该同盟的名誉主席。

12月，蒋介石借口苏联“煽动”广州暴动，与苏断交。宋

庆龄两次电蒋，谴责此举“误党误国”，并决定暂不回国，以示抗议。蒋介石对其施以种种攻击，并促宋家断其经济来源，使宋庆龄陷于困境，甚至连过冬御寒的衣服也没有。但她决不屈服，毅然亡命欧洲，常住柏林。其间除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之外，主要在邓演达的帮助下，埋头读书学习，提高中文水平，着重研究中国土地问题。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为了对付蒋介石乘机拉拢，她多次发表声明：“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④因此，奉安大典后，蒋介石特意邀请她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又遭到拒绝。

蒋介石退而求其次，希望她对政治保持沉默。但是宋庆龄决不沉默。8月1日，她向世界反帝大同盟拍发电报，强烈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武力接收中苏共管的中东路，挑起新的反苏事端，“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这“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⑤。这份电报在当天共产党发动的纪念“八一国际反战日”群众示威活动中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蒋介石极为恼怒，给宋罗织“通共”罪名，派谋士戴季陶登门威胁，警告她“不要再发表宣言”。宋庆龄回答说：“使我不说话的惟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⑥同年9月，宋庆龄经香港前往德、法等国旅行，除在邓演达的帮助下潜心读书研究中国革命外，还积极地参加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帝和保卫和平的活动，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四、反蒋抗日坎坷多

宋庆龄与蒋介石集团的对立愈演愈烈。1931年8月,宋从德国回到国内参加母亲的葬礼。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她义愤填膺,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不战而丢掉东三省十分痛心,又挺身投入抗日斗争。这年12月,在得知邓演达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的传闻后,宋庆龄亲自到南京面见蒋。从蒋口中得到证实时,她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推翻,蒋便急急逃上楼去。“九一八”后,宋庆龄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国民党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2月17日,又制造惨案,屠杀到南京请愿游行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凡此种种,使宋庆龄受到极大刺激,她对国民党彻底绝望,于12月19日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国民党已经“死亡”^⑧。然后,她与中共合作,进行了长达4年的反蒋抗日活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宋庆龄通过前线慰问、募捐钱物、建立伤兵医院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敌,被当时的美国记者称赞为“一位敢死的救国女杰”^⑨。同时,她还向中共领导的上海日资纱厂工人罢工提供捐款。为了进行这些工作,宋庆龄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几乎把自己的积蓄都用光了。夏天,为了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宋庆龄与中外名人组织了“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并亲自出面交涉。1933年3月1日日军进犯长城喜峰口时,宋庆龄与中共联合,在上海发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并任会长,提出停止内战,武装人民,团结抗日等主张;8、9月份,双方又合作,对抗国民党政府的禁止和镇压,迎来世界反帝国主义

战争委员会代表团，成功地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结，进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1934年4月，宋庆龄又受中共委托，领衔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即中共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并担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会长，积极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此外，宋庆龄还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联络中外进步人士，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又称“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主张停止内战 团结抗日 努力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主人士，并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横暴，号召人民为民权而斗争，以推动当时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运动；又依靠路易·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格兰尼奇等外国朋友的帮助 给苏区革命根据地输送医药、武器和专业人才等。

宋庆龄进行这些活动，处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之下，但她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自己的崇高威望，使反动势力为之慑服；并在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和罪行、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唤醒国民救亡觉悟、争取国际同情等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都开始调整自己的方针。共产党从1935年“八一”宣言开始，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来发展到联蒋抗日。国民党则采取联苏制日方针，与此相适应，在国内派出多路人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途径。其中一路是宋子文来找宋庆龄帮助，谋求同中共中央进行秘密接触。宋庆龄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1936年1月通过以牧师作掩护的中共地下联络员董健吾前往陕北传递信息。中共中央作出积极反应，“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10]。

如此，国共两党分裂近 10 年后，宋庆龄在两党中枢之间搭起了第一座桥梁，她感到非常欣慰。然后，宋庆龄又应毛泽东之请，为来国统区谈判的中共代表提供了许多帮助。

然而，由于国民党坚持解除中共的武装，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宋庆龄即推动 1936 年 5 月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开展一系列“逼蒋抗日”的活动，提出“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②。10 月，蒋介石迷信他的武力统一和独裁专制，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大举进攻红军；11 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主持救国会工作的沈钧儒等七君子，由此逼出了“西安事变”。事变第二天，国共及西安各方情绪激动，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宋庆龄以团结抗日为重，毅然决定亲赴西安，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行虽因条件限制而未成，却表现了她的远见卓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7 年 2 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为争取国民党中枢负责人站在抗日救国一边，出席了全会。在会上，她与冯玉祥等严正提出了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对于七君子，宋庆龄奋力进行营救，并发起“爱国入狱运动”，推动国民党军政界许多高级人士卷入斗争。1937 年 7 月 5 日她率领 11 位著名人士赴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提出如果爱国有罪的话，他们愿与七君子同狱。此举在全国掀起巨大波澜，极大地申张了“爱国无罪”的正义之声，同时也表现了宋庆龄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经过 20 多年革命斗争的锤炼，宋庆龄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政治家，“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③是一匹“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④。

她以特殊的风采投入拯救祖国的伟大斗争。

五、拳拳一片“国母”心

“七七”事变后，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中国抗战节节失利，一时间抗战“失败论”、“亡国论”弥漫全国。宋庆龄在《论坛与世纪》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引用大量确凿的资料，详细分析日本的工业、农业、资源、财政等状况后，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⑨。该文对抗战初期帮助人民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并作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宋霭龄、宋美龄、邓颖超等各党派妇女领袖密切合作，成立妇女抗日团体，积极组织广大妇女进行抗日宣传，购买救国公债，到战地救护伤员等，为重创日军、粉碎日本“速战速决”战略作出了贡献。

9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分别宣告国共重新合作，共同一致抗日。宋庆龄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实现“异常地兴奋”。她说“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高兴地看到了“充满了希望的白昼，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长黑夜”^⑩。

上海沦陷后，12月23日，宋庆龄在路易·艾黎的掩护下，巧妙躲过日军检查，来到香港，发挥其与国际社会广泛联系的作用，为祖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1938年6月，她联络贾·尼赫鲁、保·罗伯逊等国际友人及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共

同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任主席，广泛争取国际援助，支援前方抗战。

正在这时，日军进攻广州。宋庆龄两次到羊城，与人民一起保卫这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她参加反对侵略的群众火炬大游行，视察被炸现场，慰问受伤难民，巡视黄埔港等军事设施，向国民党中央及广东当局提供防御抗战方策，向美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在外国朋友中成立“保盟”广州分会等，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0月，广州失守后，宋庆龄在香港全力投入争取国际援助的工作。她通过“保盟”的《新闻通讯》和各种小册子，向国外广泛宣传中国抗战的意义和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她指出：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因此，“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⑤。中国的战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性地区”，甚至“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地区”，中国的抗战“保障了太平洋西岸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未来，……它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⑥”。因此，中国人民有得到世界人民支援的权利。中国人民不仅接受帮助，也帮助提供帮助的国家和人民。为此，宋庆龄提出“保盟”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⑦

从这个思想出发，宋庆龄为“保盟”规定的工作原则是：争取援助，但不是“乞讨”；援助者也不是“怜悯”和“施舍”。如此，宋庆龄为“保盟”和外国援华机构灌输了一种新的精神：把一般的救济工作，提到国际主义的高度，使“保盟”在争取外援时，既保持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又与世界人民增进了友谊。

与此同时，宋庆龄又不断向外国朋友提供中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的英勇业绩及困难状况，提出需要紧急援助的项目，如救治伤病员的各种医药、救济难童的食品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多外国朋友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同情，尤其是对宋庆龄一贯公正廉明、对祖国和世界人民热情服务、无私奉献精神的崇敬，积极响应，纷纷组织各种援华团体，开展筹募活动，援助中国抗战。到 1940 年 2 月“保盟”成立不到 2 年，各国朋友捐款即达 41.3 万港元（约合 13.3 万美元）。这些捐款大多数以医疗物资送往内地。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国虽都有战事，由于宋庆龄和“保盟”的工作，特别呼吁国际不要忽视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对华援助仍然不断而来，而且数额相当可观。仅 1942—1945 年“保盟”提供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各个国际和平医院的捐款即达 65.2 万美元、合 17088.7 万元法币。

领导“保盟”的同时，宋庆龄又大力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抗战初期，中国工业集中的沿海地区全部沦于敌手，大批工人流落到内地成为难民。路易·艾黎和斯诺预计到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抗战的严重意义，就拟订了一个在非沦陷区建立千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计划，发展战时经济，支持中国长期抗战。此计划首先得到宋庆龄“百分之百”的支持，从而推动宋子文、宋美龄赞成，迫使财政部长孔祥熙批准实行。1938 年 8 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

但是“工合”运动开始不久，因为“工合”顾问路易·艾黎拒绝给予回扣，孔祥熙就停止贷款，致使“工合”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宋庆龄与斯诺商议后，于 1939 年 1 月在香港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向国外独立筹募支持中国“工

合”的基金，由此，宋庆龄创造了一条把外援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的最好途径——“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⁹⁸。

外国朋友十分欣赏这种由宋庆龄反复阐述和宣传的“工合”精神，并踊跃支持。宋庆龄乘机在美国、英国、菲律宾等许多国家，推动成立“中国工合促进委员会”。罗斯福总统夫人、英国工党领袖伊莎贝尔·克里普斯夫人等著名人士，分别担任这些委员会的领导，积极为中国“工合”筹款。工合国际委员会在港两年，即得 2000 多万美元捐款。

对于外援的分配，宋庆龄执行的原则是“中国各地区应该享受救济待遇的同等权利”和“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⁹⁹。由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而他们又“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¹⁰⁰，所以宋庆龄在一视同仁地援助各个抗日战场的同时，把“保盟”和“工合”的援助重点放在敌后游击区。

宋庆龄还从政治上帮助共产党。1941 年 1 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以优势兵力袭击并企图消灭在抗战中屡建功勋的新四军。宋庆龄得此消息后，联合何香凝等通电蒋介石予以谴责，并要求“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¹⁰¹。接着宋庆龄又通过斯诺和“保盟”《新闻通讯》，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首先向世界揭露事件真相，引起国际舆论，特别是英美盟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他们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反对削弱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从而有力地配合共产党粉碎了这次反共高潮。

在积极争取外援的同时，宋庆龄也对国际上对日绥靖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等国为保护自身利益，牺牲中国讨好日本，一面卖给日本大量战略物资，一面推

动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日本侵略要求的条件下，双方实行妥协。为此，他们曾一度关闭当时中国对外唯一通道滇缅公路并筹备太平洋会议，向中国施加压力。在这个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加紧进行时，宋庆龄接连发表好几篇文章，揭露、抨击其“帮助日本加强军事机构”，迫使“中国媾和投降”，必使中国抗战“走向失败道路”；阴谋制造者也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②绥靖主义者很恼火，他们先后通过港英当局和英国驻华大使对宋庆龄施加压力，要她停止抨击，并放弃“保盟”工作，离开香港，宋庆龄严词拒绝。

事实很快证实宋庆龄的英明预见。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接着，又进攻香港。宋庆龄曾领导“保盟”工作人员进行抵抗，直到日军逼近香港机场，她才乘最后一批飞机撤到重庆。

六、一往情深筑新华

在重庆，除了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进行“保盟”和支持“工合”的工作之外，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宋庆龄与中共及爱国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开展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以迎接胜利时新中国的诞生。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改行“联共抗日”方针，又制订“抗战建国纲领”，宋庆龄曾对其产生一线希望。但是，几年来蒋介石坚持独裁，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宋庆龄对国民党再次绝望，而把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并且，她与中共取得了共识，实现新中国的关键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

1943年3月，在纪念孙中山忌辰时，宋庆龄发表谈话指出：